

与会嘉宾共话中国服务业的对外开放 建立稳定监管机制 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在中国新一轮更高层次对外开放中，扩大服务业开放是一项重要内容。服务业的开放，将如何改变中国经济的结构和对外贸易状况？金融、电信、交通运输、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需要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本土服务业是否做好了应对外来冲击的准备？

在3月27日上午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服务业的开放”分论坛上，嘉宾们指出，中国服务业开放正当其时。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将为百姓衣食住行等领域带来全方位的高质量供给，推动行业充分竞争，带来经济发展新动能，助力美好生活。

开放服务业将带来经济新动能

服务业在中国处于怎样的地位？对外开放服务业将为中国带来什么？论坛一开始，几位嘉宾通过数据分析向大家分享了他们对中国服务业的观察和研究。

“目前全球来看，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平均大概70%，发达国家大概达到75%，中国到去年年底达到了52%。这里有一个趋势，随着经济不断的发展，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肯定会提高。其次，中国每年新增1300万个就业机会，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服务业提供的。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都是服务业领域，这些领域的发展将为我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北京市副市长殷勇认为，对外开放服务业能带来经济结构优化、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升对内对外贸易竞争力等好处。



3月27日，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服务业的开放”分论坛现场。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服务业稳住了，就业就稳住了。就业稳住了，经济也就稳住了。”凤凰网财经研究院常务理事曾瀚漪说，目前中国GDP的比重第一产业27%，第二产业28%，第三产业45%，“中国要转型就是要加大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发展对中国当前来说特别重要。”

在春华资本集团主席兼创始人胡祖六看来，中国的服务业对外开放正当其时，“相对于制造业，中国的服务业对外开放度不够。”

开放要渗透衣食住行各行各业

扩大服务业开放的最终目的是什

么？对于这一问题，嘉宾们的观点非常一致，那就是推动行业充分竞争，带来服务产品的高质量供给，助力百姓美好生活。所以，开放要渗透衣食住行各行各业。

“中国要加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我希望不仅仅是金融服务，也包括医疗卫生、教育、文化，文化包括娱乐、影视、音乐都应该更大地开放。中国的老百姓有汽车开了，衣服鞋子都没有问题了，吃的也更好了，但医疗卫生服务、养老服务等仍有非常大的开放空间。”胡祖六说。

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是我国医疗领域扩大对外开放的典范。中国工程院院士、博鳌超级医院院长、浙江大学教授李兰娟

介绍，在其他欧美国家已经上市的药品，在中国没有经过认证，不能在国内的医院上市。但“国九条”政策允许博鳌超级医院优先采购使用，“仅一年时间，博鳌超级医院已经开展了134的手术，引进了人工耳蜗、眼镜、支架等11个设备，有11个项目是国内首次应用国外的药品和项目。我希望接下来，国外好的药物设备在中国能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

随着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很多本地企业担心会对自身带来冲击。对此，佰深私募股权投资集团全球高级合伙人兼大中华地区总裁张曦轲认为，本地企业应该调整好心态，在更为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找准自

己的优势。“服务业的服务对象是人，而本土企业对本地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洞悉，大的分销网络也是他们天然的优势。同时，海外企业在产品设计、创新、利用数据和IT信息化的能力上更有竞争力。所以，本土企业和海外企业之间也形成很好的互补关系。”张曦轲说。

建立一致、可预期的监管体制

“在中国的保险行业中，外国企业发挥的作用还非常小。如果进一步开放，我们公司很高兴，但在牌照申请上一定要简化手续，不是去每个省、市去打通关，这对我们非常重要。”论坛上，安联保险集团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奥利弗·贝特举的一个例子引发大家对优化服务业监管体制的思考。

胡祖六说，要真正发挥中国服务业的潜力，首先要放松管制，把过时的、死板的规章制度淘汰出去。其次要市场准入，让更多的民营资本，更多的国际机构进入中国市场，为中国的机构、老百姓提供更优质专业的服务。

张曦轲则认为，服务业的监管不在于严和松，而在于一致，即所有市场主体内外的一致性、可预期性，“如果能够做到这些，会大大提升投资人的信心。”

“制度能够持续，投资才会流进来。”德勤公司全球主席柯睿尚表示，人们寻找投资地点的时候，希望得到可持续的结论和监管制度的前后一贯。公司不希望政策频繁地变化，因为要投资，并且建立高质量的业务都需要时间，企业希望成果有稳定性。

（本报博鳌3月27日电）

老龄化问题引起热议，
与会嘉宾认为——
应从制度层面
建立健康覆盖体系

■ 本报记者 李佳飞

到2050年，中国会有超过5亿60岁以上的老人——这一预测早已引起各界广泛关注。

3月27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颐养天年——健康老龄化”分论坛上，与会嘉宾就“如何应对健康老龄化的问题”展开热议，认为应对老龄化要从制度层面建立健康覆盖体系。

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中国政府面临的问题。来自日本的武田药品工业株式会社执行董事平手晴彦说，在200多年前，江户(现在的东京)人口平均寿命约在50岁，而现在，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已达到90岁，男性平均寿命也超过了80岁，人口老龄化非常明显。

同样，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香港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林正财说，香港和许多地区一样面临着老龄化的挑战，“再过20年，每3个人中就有1个人超过65岁”。

随着老年人占比大幅增加，与年龄增长有关的各种疾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各类癌症肿瘤等都大幅增长，听力、视力、行动能力减弱等问题也十分突出。据说，日本每年的医疗支出，大部分都花在后10年上，也就是75岁到85岁期间，临终关怀的费用较为昂贵。

“按照中医‘攻防兼备、预防为主’的智慧，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照顾和管理，目标就是少生病、晚生病、更健康。”丝路规划研究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李小琳呼吁，应对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们应该积极转变思想，从“被动就医”到“主动健康”，树立以预防为主的“治未病”理念。

对此，林正财表示认同，“我们都知道预防比治疗要好，但实际的医疗体系恰恰是相反的，资源大部分用在治愈上。”

据介绍，香港特区政府鼓励每个社区都形成自己的健康中心，为社区居民提供一站式卫生保健服务，让社区居民能够管理自己的健康状况，并照顾那些出院的患者，帮助他们尽快回归社区。

应对老龄化问题，日本政府还延长了人们的工作年限。当然，日本也研究制定了支持老年人的保险制度，例如坐公交车服务、墙上贴夜光条、提供轮椅使用等，让老年人生活更便利。

香港特区政府也采取了系列举措，例如，丰富老年人的生活，同时支持照顾老人者，让及时的家庭服务和日托服务等与社区服务无缝对接，为健康老龄化提供保障等。

据悉，在中国内地，青岛市较早出台了促进医养结合服务发展的若干政策，2012年在全国率先建立了长期医疗护理保障制度，将失能老人纳入医疗保障的范围，通过医养结合，应对健康老龄化问题。

（本报博鳌3月27日电）

企业在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中扮演什么角色？ 创造社会价值 消解社会问题

企业创造社会价值带来社会稳定

企业社会价值，和人们熟知的企业社会责任有所不同。所谓社会价值，指除了创造经济价值外，企业还应主动把关注范围扩大到政府、市民等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响应他们的诉求。

“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竞争主体，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要对利益相关者和环境负责，在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论坛一开始，肖亚庆的观点就引来诸多共鸣。

崔泰源对此也表示认同，他们曾对四大下属集团进行过调研，结果显示更多受访者表示社会价值对于长期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他们也赞同将社会价值置于公司战略发展，“让人欣喜的是，股东还认为只要集团能够长期创造社会价值，他们也愿意作出短期的牺牲。”崔泰源说。

当前中国正处在从高速发展到高

质量发展的转型期，如何应对不确定带来的挑战，不仅是国家层面需要考虑的问题，也值得诸多根植于中国或在中国生根发芽的领军企业深思。这意味着，企业通过在环境、社会、管理等多领域创造社会价值，自发带头解决大量社会问题，已不是企业经营的选择，而是时代的要求。

“如果企业不愿意践行社会价值，社会就没那么稳定，没有社会稳定，商业也不复存在。对于公司而言，不愿意创造社会价值，便不会有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就没有未来。”林毅夫说。

创造社会价值并不只是大企业的责任

履行社会责任、创造社会价值，意味着要拥有资金和资源。只有大企业才可以更好地创造社会价值吗？如何说服和鼓励中小企业从成立伊始就开始履行社会责任，创造社会价值，哪怕他们还挣扎在生存线上？

在互动环节，该问题一经抛出，便引来众多关注。“当下商业环境已经发生变化，获得短期的经济利益是无法

保证一家公司获得长期、可持续成功的。”SK集团高级副总裁丁铉干认为，商界也越来越认同，创造社会价值越来越成为企业获得认可的要素。

天津泰达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邹凌杰也持相同观点，他认为除了社会和政府提供的好的政策外，不管哪一类企业都可以通过创造社会价值积极创造好的营商环境，这是相辅相成的，“我们集团积极走出去到非洲成立环境和文化保护组织，建立平台关注社区、学校、医疗等领域的发展，其实都是在主动地打造好的营商环境。”

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社会问题耗费了巨额的社会资源，同时也阻碍了经济增长与企业潜力开发。不少嘉宾认为，不管是哪种类型的企业，不管大企业、小企业，都要树立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意识，积极创造社会价值，逐步实现绿色工业化，确保社会政治稳定，让我们及后代可以继续从事商业活动。

鼓励和惩罚并举 创造更多社会价值

不可否认，创造社会价值一定是需

要成本的，并非人人都可理解，这势必需要奖惩分明。“对一些在创造社会价值上做了很多努力的公司来说，他们应该被认可，政府、社会都应给予他们一些激励，比如调整税务政策等。”林毅夫认为，而那些给社会找麻烦、破坏环境的企业应该支付更高的税。

华为公司公共与政府事务副总裁安德鲁·威廉姆森表示，企业只有专注专业，发挥企业核心优势，才能更好地消解社会问题。例如，在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方面，华为积极让更多人享受移动互联网带来的便利，也在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帮助聋哑孩子解决读书问题，再用大数据、云计算将其推广到全球更多地方，这些都是将社会问题融入企业发展的具体表现。

对于企业来说，追求社会价值必须要有更高目标，他们应该有效创造社会价值，解决重大社会问题。肖亚庆认为，想要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企业要做到以下几点，即不断提高持续盈利能力，提高产品品质和服务水平，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热心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本报博鳌3月27日电）

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专家建议：可进行从间接融资到直接融资的“突围”

增加小微企业融资渠道

台湾永丰商业银行董事长陈嘉贤认为，如果大银行多的话，中小企业融资相对就困难，这是市场自己的演进。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认为，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企业的贷款如果不能实施的话，有传导机制问题。但是金融和小微企业贷款困难，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不完全有关。

小微企业融资困难本质上来说三个不对称，一个是信息不对称，一个是风险不对称，一个是收益和成本不对称。小微企业融资难是全世界难题，小微企业如何解决融资难呢？

对此，朱民分享了世界上一些先进经验供参考。首先是德国模式：德国与中国相似，有大量制造企业，中小

企业，这里由大银行提供流动资金给区域、社区银行，区域、社区银行再贷款给中小企业，同时服务于政府建立的担保、政府和民间的这一信用体系，这个案例对中国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此外，利用金融合作伙伴，促使政府和科技金融合作是有用的，譬如蚂蚁金服，也可以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

德意志银行中国区原董事长张红力认为，中国金融要二次腾飞，从融资角度来说，无论对中小企业来讲，还是对实体经济来讲，都应该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化。

注重风险预测与防控

张红力认为，金融危机产生原因

主要有“六超”，一是超前的消费文化，二是超复杂的金融创新，三是超弱的监管协同，四是超大量债务积累，五是超高的杠杆，六是超贪婪的文化。针对这些，我们金融所要“突围”的是什么呢？张红力说，10年金融危机过后，目前的金融风险似乎还在积累。在这样的情况下，变间接融资为直接融资，似乎是好的“突围”方式。

此外，还需要稳定投资率。意大利经济与财政部部长乔瓦尼·特里亚认为，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多边机构的帮助，特别是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需要进行协调，宏观整体经济政策也要协调。因为实体经济和金融行业联系非常紧密，如果不好好协调就会有崩溃的风险。对此，美国全国商会执行副会长兼国际事务总裁薄迈伦也从美国经受的挫折说起，他表示美国金融危机有货币政策的一些失误，也有一些消费者的债务，还有楼市的泡沫，也

有风险的防控不够妥善。所以，吸取的教训就是要多度监管，对于风险过高的地方，要用金融工具进行监管。

鼓励实业进行技术革命

最近几年，为什么存在产业发展脱实向虚的问题？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李晓鹏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发展实业回报率过低，不能完全覆盖金融行业融资成本，这也使得一些金融机构寻找投资项目中出现一些困难。因此，现在问题是社会发展中的实体经济创新步伐要加快。

“所以我们要大力推进工业革命，推动技术创新，培养中国的大国重器，使实体经济能够在技术上领先，企业资本回报率上也可以适应融资要求。”李晓鹏说。

（本报博鳌3月27日电）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次贷危机10周年后，金融是否由“自我服务”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如何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这一世界范围内的难题？3月27日下午，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金融‘突围’”分论坛上，来自国内外的金融专家就此展开讨论，并给出方向性建议。

博鳌亚洲论坛嘉宾热议中国区域化发展新趋势
中国区域化发展进入都市圈时代

■ 本报记者 孙慧

随着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城市之间协同、联动发展成为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城市和城市之间连成一体，在人口和经济活动等方面存在密切交叉互补作用，迈出了第一条新型城市化道路——城市都市圈。

城市都市圈，会是破解中国未来城市化发展难题的密码吗？3月27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中国区域发展的都市圈时代”分论坛上，参会嘉宾围绕该话题开展讨论。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都市圈研究中心主任刘学敏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60%，在城市形成产业和人口的聚集，客观上形成了都市圈化。城市都市圈化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人口向核心区域聚集，也同时向外圈层聚集；二是居民跨区域就业通勤形成规模；三是城市空间沿着交通廊道或以轴带形状扩张，形成网状化发展；四是产业链条以特大城市为重心向周边扩散。刘学敏说，进入都市圈时代，就要求我们要摈弃原来的城市化压力，以系统、创新的思维来重新审视中国未来的城市化，推动都市圈的发展。

国务院参事徐宪平认为，城市群之间由于规划尺度过大、跨省协调困难，有规划无落实成为中国城市群发展的尴尬现实。当前，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比构建跨区域城市群更能产生积极的落地效应和示范效应，加强城市群的发展，首先要发展好以特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再由各都市圈协同融合成区域的城市群。

如何促进城市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徐宪平说，从以往实践上看，首先要做的是基础设施一体化，其次就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但这要涉及到不同城市的权、事权的交叉，目前还难以做到。由于目前的城乡二元体制，很多农民工即使进城就业安家，也难以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务，所以最根本是要破除城乡二元体制结构，才能真正推动都市圈内一体化融合发展。

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院长顾强认为，当前，中国很多城市没有在城镇体系里把都市圈做一个整体来规划，出现了很多“城市病”的问题。促进都市圈的发展，首先是要把周边的微中心和节点城市纳入到都市圈规划，以微中心建设来促进都市圈空间结构的优化和高质量发展。

（本报博鳌3月27日电）